

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

◎周宁 著

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

◎周宁 著



商務印書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周宁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ISBN 978 - 7 - 100 - 08324 - 9

I. 跨… II. ①周… III. ①东西文化 — 文化交流 — 研究 — 中国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1844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

周宁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8324 - 9

2011年10月第1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6 1/4

定价：45.00 元

厦门大学闽江学者特聘教授基金资助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西方中国形象的变迁及其历史和思想根源研究”中期成果

目录

前言	1
----	---

乌托邦或意识形态：西方现代性想象中的中国形象	17
------------------------	----

一 跨文化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	19
----------------	----

- 1 基本问题与知识立场 19
- 2 形象、类型、原型：三个研究层面 22
- 3 在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 32
- 4 两种东方主义 39

二 “孔教乌托邦”：在社会期望与审美期望之间	44
------------------------	----

- 1 社会期望中的“孔教乌托邦” 44
- 2 从社会现代性转向审美现代性 51
- 3 审美期望中的“孔教乌托邦” 62

三 “停滞的帝国”：从启蒙大叙事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	77
---------------------------	----

- 1 “停滞的帝国”：西方进步大叙事中的他者 77
- 2 东方专制帝国：西方自由大叙事的他者 84
- 3 野蛮或半野蛮的帝国：西方文明大叙事中的他者 96

“在长城的那一边”：俄罗斯思想中的“中国” ……105

- 一 西方派：通过“中国”批判俄罗斯自身的东方性 ……109
- 二 斯拉夫派：在“俄罗斯独特性”意识中发现“中国” ……118
- 三 欧洲与中国：俄罗斯自我意识中的双重他者 ……125
- 四 中国：帝国欲望与恐惧的对象 ……139
- 五 东西还是南北？难以安置的中国形象 ……148

“我们遥远的近邻”：印度的中国形象 ……155

- 一 相邻却最遥远 ……159
- 二 相亲未必相知 ……167
- 三 “圣诞老人”的伤心之旅 ……176
- 四 穿越世世代代的回忆 ……183
- 五 相关可能相仇 ……190
- 六 相仇未必是真意 ……197
- 七 印度之两难：“西方之东方”或“东方之西方” ……205

“巨大的他者”：日本现代性自我想象中的“中国” ……217

- 一 “脱亚入欧”：“告别亚细亚之恶友” ……221
- 二 “兴亚抗欧”：“代替支那人作为支那着想” ……230
- 三 现代性自我想象：“原罪性亚洲身份” ……240

四 “东方”的东方主义陷阱	249
五 西洋与东洋：在双重“他者”之间	256
六 “污名化”中国的世纪	265
七 通过“中国”超越自身危机	272
八 西方现代性：“陷害”日本“诬陷”中国	279

跨文化形象学的中国问题：《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总序

一 中国形象研究的三组问题	291
二 跨文化形象学的起点：西方现代性想象中的中国	301
三 世界的中国形象：跨文化流动与西方霸权	315
四 世界的中国形象：“自我东方化”问题	323
五 世界的中国形象：“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	333

附 录

东方主义：理论与论争	343
汉学或“汉学主义”	355
两种“东方主义”：超越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	373

参考文献

后 记

前言

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源起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现代中国思想是否可能超越西方现代性观念而思想自身？用西方的“中国思想”思想中国，中国是否可能在思想上被他者化？背弃中国历史主体的反思，即使可以看到中国过往的陷阱，也看不到中国未来的前景。不论“五四”时代的经典自由主义传统，还是后“五四”时代反现代西方的革命传统，实际上都难以摆脱西方现代性观念霸权。而这种霸权真正令人生畏的是，你无法不在西方现代性框架内思想中国，除非你放弃思想。如何从现代性思想中拯救中国的文化主体？这个问题直接面对西方现代性观念体系中中国话语的生产分配的方式与意义。2006年出版的《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是以跨文化形象学为方法对相关问题的反思。

面对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宏大问题，学者的使命首先是找到自己专业的方式。笔者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试图以跨文化研究为方法，以中国形象为个案，从一个侧面研究全球化时代中国现代性自我构建的问题。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建立在“异域形象作为文化他者”的理论假设上，从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在西方现代性自我确证与自我怀疑、自我合法化与自我批

判的动态结构中，解析中国形象；在跨文化公共空间中，分析中国形象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经验的过程与方式。

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在思想领域提出的主要问题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如何生成演化？如何参与构建西方现代性自我？如何在意识形态或社会无意识意义上形成“互为主观性”与“互相他者化”的关系？如何影响中西关系与世界现代文化格局？如何塑造中国的现代性自我想象？如何控制着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的生产与传播，形成后殖民时代的泛东方主义化倾向？如何左右中国的国际文化环境或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国际环境？

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属于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观念史研究。罗伯特·达恩顿在《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中将观念史研究分为四个领域，一是对体系化的思想的研究，如哲学、一般科学理论、神学等方面的研究；二是对日常思维、一般社会思潮与社会舆论、文学艺术运动的研究；三是对意识形态和思想传播方式的社会史研究；四是对世界观、群体心态等问题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①以西方的中国形象为起点的跨文化形象学，研究“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同时涉及这四个领域中的问题。

就具体方法而言，跨文化形象学在二维文化空间中解释观念，既要观念史中出现的具体文本进行细部分析与编年整理，又要求在不同文本之间建立起一种整体性的关系结构，发现某种知识与想象类型以及由不同类型构成的、具有断裂、转型与连续性的话语谱系。这就意味着：一、在类型或知识领域的历史个性中解读知识或想象的“观念化”过程；二、在同时代的观念体系及其社会经济政治参照框架中分析特定观念的构筑过程；三、在历时代的话语谱系

^① 参见（美）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中，考察不同的观念类型的形成、转型、交替的过程。^①

跨文化形象学以跨文化研究的方法，分析不同国家地区一般社会想象中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该研究提出的问题，涉及观念史研究的四个领域，不是任何一个单一学科研究可以回答的。跨文化形象学具有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或非学科性。

跨文化形象学不同于汉学或比较文学形象学，更接近于文化研究。汉学研究假设它是一门高度专业化的学科或知识体系，与社会想象和话语实践无关。汉学研究关注的是纯粹知识问题，而跨文化形象学关注的是知识与想象的关系以及渗透知识与想象的权力运作方式。比较文学形象学大多只关注文学文本中的中国想象，而跨文化形象学在一般社会观念意义上研究中国形象，涉及不同类型的文本，关注不同类型的文本相互参照渗透、共同编织一般社会观念或一般社会想象的话语社会学问题。比较文学形象学依旧属于文学研究，研究想象文本中的中国形象特征，往往描述“是什么”，不追问“为什么”，缺乏真正的问题意识；而跨文化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已经超出单纯的文学研究，同时进入文学、历史、哲学各学科，并倚重现代社会理论。比较文学形象学仍然是文学研究，跨文化形象学则首先是文化研究；比较文学形象学是没有问题的学科，而跨文化研究形象学，是没有学科的问题。跨文化形象学的思想挑战性与开放性活力，也正体现在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或非学科性上。

跨文化形象学探索从学术通往思想的道路。《天朝遥远》在跨文化形象学框架内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从什么角度提出问题，在什么深度上分析问题：它从跨文化的角度提出问题，研究中国形象的构成与意义、形象的类型化特征与原型；在西方现代性的深度上分析问题，讨论中国形象的生成在西方现代文化中的

^① 参见 *Fin-de-Sie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 by Carl Schorske, New York: Knopf, 1980, pp.45—46.

功能。《天朝遥远》在西方现代性观念的纵深处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形象、类型、原型三个层次上分析中国形象的思想结构，在西方现代性话语实践中分析中国形象的文化功能。

在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讨论中国形象，首先面对的是西方现代性精神形成时期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其问题在于，从传统的、基督教伦理主导的“统一的文化价值”中挣扎分离出来的西方现代文化观念，诸如民族—国家与民主政治信念、世俗化物质主义与个人主义、科学与进步观念、理性主义哲学等，最初如何借助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隐喻地表现自身，完成西方现代性的自我建构。西方现代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从一个侧面证明，现代性思想形成于跨文化或文明之际的“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中，是一个多元发展、相互作用的进程，不仅西方现代性塑造了现代中国文化，中国形象也作为“文化他者”参与塑造西方现代文化的“自我”。

中国形象是西方现代性自我建构的“他者”。它可以是理想化的，表现欲望与向往、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的乌托邦；也可能是丑恶化的，表现恐惧与排斥、满足自我确认与自我巩固需求的意识形态。启蒙运动高潮时期，西方现代性确立，中国形象也相应出现彻底的转型，从社会文化想象的乌托邦变成意识形态。中国成为停滞衰败的帝国、东方专制的帝国、野蛮或半野蛮的帝国，三种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类型出现。

西方现代性自我观念的构成与身份认同，是在跨文化交流的动力结构中通过确立“他者”完成的。收入本书的《乌托邦或意识形态：西方现代性想象中的中国形象》一文，试图清理《天朝遥远》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天朝遥远》完成后，笔者一直无法释怀：一是跨文化形象学的研究还有待继续，包括深化问题、扩大领域、明确方法；二是已完成的研究仍有待反思，为这本史料丰富、论证繁复

的“大书”写一个纲要，或许篇幅比一篇论文要长，但肯定应该比一本书短，这样读者才可有时间阅读并读得明白；三是对这本书在有限范围内引起的误解做些必要的说明，毕竟国内不少学者读自己同道的书，只想从中获取自己需要的资料，却不仔细琢磨其中的观点与道理。

关于第一项工作，也就是清理跨文化形象学研究的基本问题、领域、观念与方法，笔者在为“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丛书写的导论中，首先对跨文化形象学的基本问题与研究领域做过系统规划，其中有关中国形象研究主要包括“三组问题”：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中流露的“自我东方化”、“自我西方化”的问题；三、域外的中国形象，主要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影响或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中国自我形象认同的“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如何影响中国现代性文化自觉与文化重建的问题。三组问题相互关联，在理论上指向中国现代性自我认同与文化自觉问题；在实践上关注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与地缘政治战略的文化背景问题。

这篇导论经过修改后，以《跨文化形象学的中国问题》为名收入本书。至于第二项工作，直拖到最近才完成。《乌托邦或意识形态：西方现代性想象中的中国形象》便是笔者尝试写出的所谓的“纲要”，试图对《天朝遥远》的观念与方法进行系统的反思与概说。西方的中国形象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是“西方”所以重要，而是因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是跨文化形象学中国问题的起点。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范围内西方现代性文化霸权渗透到各个领域，其中

西方的中国形象也随着西方现代性思想扩张，或多或少地控制着世界不同国家或文化区的中国叙事。这样，第二组课题的核心问题即是：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以及其中西方话语霸权的问题。

思想的历程中，一部著作的完成，只是一个起点，一个开放向更多疑惑与思考的起点。笔者反思跨文化形象学为什么研究、研究什么、如何研究，以及如何进一步研究。在《天朝遥远》所进行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的边界或尽头，出现的是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问题。这个问题指向两组相关的课题：一是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彼此东方化”的问题；二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影响或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自我东方化”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的西方形象和“西方主义”的问题。

跨文化形象学进一步的研究，在扩大研究领域的同时也深化问题。为什么只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如果是这样，解构西方的“汉学主义”的前提就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有必要开展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发掘中国形象在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意义维面与多元意义语境。研究的最初动机可能是解构西方中国形象的文化霸权，但研究的过程却不断印证这种霸权的强大与深入。但愿解构本身就具有颠覆性力量。笔者的研究集中在俄罗斯、印度、日本这些大国的中国形象上。这三个国家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相关，与它们的关系，构成21世纪中国最敏感也最危险的国际关系；而他们的中国形象，构成他们面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国家战略背后最深层的文化动机，直接关系到中国和平崛起。

笔者完成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随即进入第二组课题，研究世界不同国家与文化区的中国形象。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不仅关注西

方的中国形象问题，也关注其他国家的中国形象问题。否则，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本身，就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前提下进行的。世界的中国形象课题探讨现代中国自我认同的多重维面与多重意义。现代中国的自我认同，是在与多向他者的意象性关联中完成的，从中中国可能获得不同的身份。如果说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那么，世界不同国家地区文化圈的中国形象，则是个多棱镜。在多棱镜中认同现代中国的自我身份，既是一种建构过程，也是一种解构过程。建构是发现现代中国自我的意义的丰富性，解构的功能则从意义的差异矛盾与比较批判中觉醒到镜像认同的虚幻性与异化过程。

跨文化形象学研究的中国问题，必然面对所谓的“世界的中国形象”问题；而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必然面对西方现代性的文化霸权问题。笔者的研究提出四个在逻辑层面上不断深入的问题：一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中国形象各自的特征及其演变的历史，他们出于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与现实环境，形成不同的中国形象及其表述策略，其动机与形式都具有自身深远的文化根源；二是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中国形象越来越频繁便捷地进行“跨文化流动”，形成中国形象的世界观念体系，任何一个国家地区都无法“独自”地表述中国，其表述资源与策略都具有跨文化特征；三是中国形象的世界观念体系中存在着西方的文化霸权，往往是西方的中国形象为其设定问题、提供思想资源、想象方式与表述策略。西方的中国形象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世界的中国形象的表述，这一点不论在俄罗斯、印度还是日本，都表现得非常充分；四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中国形象，既意味着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同时也隐喻着他们与西方的关系，其中包含着一个特定的、纠缠不清的、危险的三角关系。

在《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丛书启动的同时，笔者个人也开始

同步研究。首先是俄罗斯的中国形象。俄罗斯思想是在面对强大的西方他者进行自我确证时想象并引述中国形象的，在俄罗斯思想家的言论中，中国形象不断出现在“俄罗斯与欧洲”的论题下。中国形象成为与俄罗斯的西方形象相对立的他者，没有独立的意义。一个特殊的文本现象就是俄罗斯思想总是在与西方形象对比时讨论中国形象，中国形象的表现并不取决于俄罗斯对中国的态度，而取决于俄罗斯对西方的态度。俄罗斯的中国形象不仅是俄罗斯的西方形象的对应物，也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派生物。俄罗斯的中国形象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折射，是中国映现在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的他者形象。中国形象与西方形象构成俄罗斯文化自我确认的东西方两极，但这两极远不平衡。中国形象包容在西方形象之中，不论是意义还是价值，也都无法与西方形象抗争。中国形象不可能构成与西方相抗衡的对等的两极，俄罗斯思想也不可能在中国形象与西方形象之间谋取自我确认的平衡，俄罗斯身份依旧会划入巨大的西方。俄罗斯思想试图利用中国形象超越西方的东方主义，但又陷入俄罗斯式的东方主义。西方式的东方主义是排斥性东方主义，东方是一个不断蔓延令人无法捉摸也无法控制的他者；俄罗斯式的东方主义是包容性的东方主义，东方是一个不断被收复被涵化的他者，因为俄罗斯本身深广的东方性使东方可能被包容到自身。俄罗斯思想中的中国形象总体上看浅显暧昧，这是由俄罗斯文化自我本身的暧昧性决定的。从西方看俄罗斯，俄罗斯是东方；从东方看俄罗斯，俄罗斯又是西方，这种分裂的二元性使俄罗斯文化的自我想象左右为难，既沮丧又傲慢。没有明确的自我便没有明确的他者。

俄罗斯的中国形象研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形象与西方形象始终构成俄罗斯现代性想象中的双重他者，离开了西方形象的对照，中国形象在俄罗斯思想中就失去了意义。印度的中国形象似乎

也有同样的问题。印度现代“发现”中国的意义，必须“迂回”到西方。印度的中国形象的明暗冷热，往往取决于印度的西方形象与西方的中国形象。印度的西方形象处于否定状态时，印度不仅在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反面想象中国，也刻意拒绝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影响；反之，如果印度的西方形象处于肯定状态时，他们不仅复制西方的中国形象，而且将自我想象为中国形象的对立面。印度的中国形象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印度与中国有2000多年交往的历史，但印度的中国形象大多数时间是个空白或者模糊不清。印度对它这个庞大的邻国的冷漠是令人吃惊的。现代印度独立运动时期突然对中国产生了非同寻常的热情，中国形象似乎可以为印度现代文化独立自觉提供合法性佐证。在过去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印度的中国形象先是逐渐被美化，充满政治浪漫热情，后是突然转化，丑化的中国形象表现着新生的仇恨与久远的冷漠。值得注意的不是印度的中国形象中的敌意，而是它的“随意”。中印战争固然是印度的中国形象的一个转折点，但似乎还有比战争更深远更内在的文化原因。冷战结束，中印崛起，在敌意即去未去、善意将来不来的时候，冷漠依旧。印度的中国形象没有充分理性化的认知基础，没有是非坚定的意识形态立场，也没有独特有效的话语体系。

俄罗斯、印度，或许还有日本，所有这些现代“东方”的中国形象，最终只是“东方”的一种自我东方化叙事，不仅视野与立场是西方，想象的主体也是西方的。表面上看“东方”国家在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中获得现代性文化的自我确证，实际上同时将自我变成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体系中，非西方国家之间是否已经失去了思考对方的意愿与能力？难道只有西方在思考世界，而我们只思考西方并模仿西方思考？分析这些国家的中国形象，一个明显的共同的问题就是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

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是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这一点日本的中国形象也不例外。

全球化进程中不论现代俄罗斯、印度或日本，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这些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他们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他们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Bryan S. Turner 在其 *Orientalism, Postmodernism and Globalism* 一书中指出，超越东方主义的问题关键在于超越西方视野与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东方主义到全球主义或用全球主义取代东方主义/西方主义，这样不仅破除东西方地缘政治与文化的偏见束缚，也要破除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偏见。^①但问题是，在全球主义视阈下提出的问题，可能会威胁到全球主义假设的合理性本身，而解构西方中国形象霸权的过程，又可能展示这种霸权根深蒂固的影响。

跨文化形象学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世界观念体系以及该体系中现代国家与国民自我认同的问题。对于那些“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不管是“进入”还是被强行“拖入”现代世界体系，其文化自觉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文化困境：就是如何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确认自身的国家身份，它关系到“国家理想”。很少有哪个国家能够避免这个问题的困扰，更少国家能够从现代性世界观念体系中成功地拯救出自身的文化主体。研究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这才是关键的问题。

^① 参见 *Orientalism, Postmodernism and Globalism*, by Bryan S. Turn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